



0006007

中国 经济思想 史

第 1 卷

赵靖 主编
石世奇 副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557907



2 018 1162 8

中國經濟思想通史

心靖

主編

石世奇副主編

任繼愈



北京大學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一部纵贯中国数千年经济思想发展全过程，“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大型史学专著。全书共六卷。本卷论述了从夏商到西汉中叶的经济政策和思想，精辟分析和探讨了这一时期代表人物和重要著作的经济思想。

全书立论新颖，见解高远，史料丰富、翔实，是一部颇具特色的学术专著。

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一卷）

赵 靖 主编

责任编辑：周湘 古岳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3.125 印张 570 千字

1991 年 5 月第一版 1991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301-01305-1/F·115

（平）定价：12.15 元



赵 靖

山东省济南市人，1922年9月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讲话》、《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概论》(以上自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名著选》、《中国近代实业家的经营管理思想》(以上主编)等。在《经济研究》、《人民日报》、《北京大学报》、《经济科学》等刊物发表过中国经济思想史论文约70篇。



石世奇

天津市人，1932年4月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院长，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秘书长。曾参加编写《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中国近代实业家的经营管理思想》等书，并担任《中国近代实业家的经营管理思想》一书副主编。在《北京大学报》、《经济科学》、《江淮论坛》等刊物发表过中国经济思想史方面论文十余篇。

主 编：赵 靖
副 主 编：石世奇
编 委：裴 倜 孙树霖
张守军 郑学益
陈喜忠 张劲涛
谢百三 姚中利

序

作序历来有两种情况，一是请人作序，一是作者自序。此序既非前者，也不纯属后者。

我写书从来不请别人作序，而是只写一篇自序。但是，这部《中国经济思想通史》是一部集体著作。我虽是主编，也只是作者之一。由我来写序，不能称为“自序”。但是，我又不能自外于作者。称为“主编序”，又似乎有“敢为天下先”之嫌。所以，就只好来个既非此也非彼的情况，仅以一个“序”字名篇了。

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已有了六十多年的历史，但迄今还是一门正在开拓中的年轻学科。过去已进行的开拓工作，基本上可分作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本世纪二十年代中叶开始，到四十年代末而陷于中断。唐庆增、甘乃光、熊竊、赵丰田、夏炎德等，是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第二阶段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到八十年代而出现了初步繁荣的局面。我忝为第二阶段的主要带头人之一，对这门学科的开拓工作的艰辛历程深有体会；对我自身从事开拓的经历，回想起来，也不胜感慨系之！

四十年代前期，我在大学读经济系。当我开始对经济学及西方的经济思想史的基础知识有了一定了解之后，就产生了一种想法：为什么经济系的课程讲的都只是外国的东西？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有悠久的历史，难道中国人自古就只知道经济生活而不思考经济问题，就没有经济思想吗？这时，我从图书馆目录卡中见到甘乃光、唐庆增等人著作，不禁欣喜若狂。我借来他们的著作，如饥似渴地读起来。然而，读后的感觉却是茫然，是失望。当时，我还不懂马克思主义，看不出他们的著作的症结所在；只是感到书中所谈的比较支离、牵强，令人看起来不得要领。这样，

我逐渐失去了兴头，再加上当时我所以想了解点中国经济思想史主要还是出于好奇心，并没有献身于这门学科的确切意愿，自然就浅尝辄止，知难而退了。

解放后我长时期担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工作，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有了较多的阅读和钻研，尤其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打下了初步的学习基础。虽然长时期中，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未能下功夫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但在考虑经济学理论方面的问题时，往往就会自然而然地和自己所知道的中国古文献中的事例结合起来，从而感到深有启发，耐人寻味。这样，在五十年代末，当国家需要在高等学校中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并决定抽调人力从事这方面的开拓工作时，我就不揣固陋，请缨上阵了。

我自幼喜读古书，对古代的某些典籍曾有涉猎；但在我懂得马克思主义以前，却一点也看不出其中有什么值得注意的经济思想。四十年代前期，我所以想学点中国经济思想史却不得其门而入，原因正在于此。五十年代后期起，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仅使我掌握了在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中进行科学开拓所需要的犀利工具，而且使我深深懂得了对待历史遗产的正确态度，懂得了民族虚无主义对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危害，从而产生了进行这方面学术开拓的明确动力。这样，在研究、开拓工作中就有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过去读过的许多古书中，我惊奇地发现了从来没有意识到的精采经济思想；过去未曾读过的文献，一经披览也能比较容易地发掘出经济思想方面的宝藏。此时的心境，真有些像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和王摩诃的《桃源行》中所写的：在未找到洞口时，遥看一处攒云树”，迷迷濛濛，莫知所向；一找到并穿过洞口，就豁然开朗，置身于“进入千家散花竹”的人间仙境。科学开拓的劳动，不用说是异常艰辛的；但从开拓成果所感受到的欣悦，对开拓者来说却不啻是十倍、百倍的

报偿。进入桃花源的渔人，由于“尘心未净”，在桃源仙境中只可能是一个旁观者，不几天就匆匆离去了。我却不想作《桃花源记》中的渔人。我已深深爱上了这一园地，一旦进来并初步站住了脚跟，就再也不愿离去，而要扎下根来，作这一园地的终身开拓者了。我所以要这样做，不是想学陶渊明、刘子骥之类的“高尚士”，幻想寻找一片脱离现实的“净土”；而恰是要竭尽自己的全部心血、精力，开发出此中的宝藏，以奉献给祖国，奉献给人类。

从那时起，我在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学术园地中就坚持下来了，一步步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这中间自然不是没有困难和挫折，其中就包括那场史无前例的对文化的大“革命”。但是，不管怎样，毕竟是坚持下来了，而且是继续前进了。

我所以要回顾自己在这门学科的开拓中走过的道路，主要是为了以自己的经历为这样一个真理提供历史的见证：科学的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的研究，有无马克思主义指导，情况会大不一样。我在解放前所以刚刚涉足中国经济思想史就立即缩回，解放后所以能在几十年中始终如一地坚持下来，我还是我，今昔之异，离开了是否懂得马克思主义这一点，是无从索解的。

我无比欣喜地看到：解放以后，尤其是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中，有一批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辛勤地、多年如一日地进行着科学的开拓，形成了这门学科的中坚。这门学科，虽然迄今仍是一个开拓中的学科，但已不再是人迹罕至的漠漠荒原，而是一个“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初具规模的开发区了。

我尤其高兴地看到：这一园地中，已开始有一批年轻的学者成长起来，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具有为科学事业献身的意志和决心，日益成为开拓队伍中的生力军。

一门新兴学科，在开拓过程中，不但必须经历胼手胝足的长

期艰辛，还要不时地经受来自多方面的风风雨雨。但是，只要开拓者的方向对头，意志坚定，各种艰难挫折，都会被甩在身后，而胼手胝足的辛勤终会带来不断丰收的欣悦！中国经济思想史在其开拓的历程中，已经走过了并非平坦的道路，今后也不会总是一帆风顺的。但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开拓者们，既然已经筚路蓝缕地开辟出最初的一片平畴，也定能在不远的未来，开发出五谷丰登的千里沃野。每一个有志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开拓事业的人，都应为此而努力。我们写这部《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也正是想为此而尽其绵薄。

本书是以北京大学的中国经济思想史教学资料和教材为基础，经过反复研究、讨论、考订、充实，并重新组织力量撰写出来的。北京大学在长期的教学中，积累下大量教学资料。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已经先后写出和编纂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华书局出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华书局出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讲话》（赵靖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赵靖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名著选》（赵靖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等书。这些书对我们写这部《中国经济思想通史》自然是比较切近、比较直接的出发点。

本书由赵靖任主编，石世奇任副主编，参加编写工作的还有：裴调、孙树霖、张守军、郑学益、陈喜忠、张劲涛、谢百三、姚中利等。

写作的制度是：参加者按预定分工撰写各章初稿，初稿写成后，经过集体讨论，一般由执笔人修改或写二稿，少数章增加人力进行改写或重写，最后经主编统一修改定稿。

本书第一卷付梓前，蒙胡寄窗、巫宝三、叶世昌教授提出宝贵意见；巫宝三教授及朱家桢、虞祖尧、王同勋、赵基凯、路兆丰等教授、专家，还亲自出席了审稿讨论会，赐教良多。在此谨

致由衷的谢意！

这里，我要特别向胡寄窗、巫宝三两位前辈致意。在我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以前，巫宝三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及经济政策资料选辑》第一册（1840—1864）已经出版。这对我们的编写工作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和借鉴。虽然巫宝三教授的计划因故未能继续下去，我至今仍然怀着亲切的感情提到他的先驱性工作对我们的启发和帮助。胡寄窗教授的《中国经济思想史》更比我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早出许多年。我在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时，曾有在完稿后即着手写古代部分的想法。读了胡寄窗教授的书以后，我觉得要写出自己的风格和特点，就必须先下功夫认真研究胡著。由于胡著是分卷出版的，中间又因十年动乱拖延了出版时间，我着手的时间也随之推迟了许多年。我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已经初步确立了自己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体系；这部《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将使这种特点更加发展，更加明确和更加完整。但是，唯其如此，我更觉得需要向胡寄窗教授表示感激之情：我不仅从他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习和吸收了许多东西，受到了很多的启发；而且，我和我的著作，在体系、方法和内容方面不同于胡著的特点，也是在不断研究胡著中形成起来的。

本书的写作得到国家教委博士点科研基金及北京大学研究生院的资助，在此并致深切的谢意！北大副教授陈为民、原北大教师肖麟，研究生郑晓云、刘荣阁、于海莲、陈玲、郑桂霞等，参加过部分章节的讨论，并协助做过若干技术工作。

《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一卷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定稿付梓之日，正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四十周年大庆即将来临之时。我们全体作者更加感到豪情满怀，幸福无限！中国经济思想史真正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建立起来，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我们所有从事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和开拓的人，从切身的经历都

深深体会到：没有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就不会有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的今天，更不会有这门学科繁荣昌盛的美好前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的前夕，向祖国母亲敬献这点薄礼，也算是略表自己的“寸草心”吧！

赵 靖

1989年9月1日

导 论

本书取名《中国经济思想通史》，顾名思义，是要写一部纵贯中国数千年来经济思想发展的全过程，阐明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规律的学术著作。

解放前出版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著作无一例外地都是断代史，而且只是关于先秦和近代两个阶段的。解放后出版了若干种较完整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和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著作。这些著作在时间上总算把从先秦到近代的各个时期都包括进去了。但是，这些著作都还不是中国经济思想通史。有些作者既写了古代经济思想史，也写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还没有人写出过一部从先秦到近代的系统的大型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的著作。本书首先要在时间上实现“通”的要求，而更主要的是要在探求中国经济思想的历史发展规律方面下功夫，力求在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史的研究中“通古今之变”。^①

本书的研究及论述的范围，从中国进入文明的时代开始直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阶段终结，即由夏商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漫长历史时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经济思想，属于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的范畴。现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实践的意义更为重大，对学术的发展、前进，意义更为深远，因而更值得我们重视。中国虽有丰富、灿烂的文化遗产，但中国人在经济学方面的黄金时代，不在过去而在未来。在我们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历程中，也将在创立中国的现代经济科学方面做出震烁世界

^① 司马迁：《报任安书》。见《前汉书·司马迁传》。

的贡献。不论我们的前人在经济思想方面的成就多么值得我们自豪，它毕竟只能算是中国经济科学的前史。

不过，目前中国的现代经济科学还处于萌生的阶段，要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总结其发展过程和发展规律，条件尚不成熟。因此，这部《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也就暂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为自己的下限。

在进入具体的论述前，有必要对下列几个一般性的问题，先作些探讨。

（一）中国文化遗产的珍贵部分

中国是人类文明的主要摇篮之一，在长达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创造和积累了异常丰富、异常灿烂、光辉的文化遗产。中国经济思想的历史遗产，在其中居于很重要的地位。

中国的文化遗产，素来受到世界公正人士所尊重。其中有些内容，早已传播国外，为许多国家的人士所了解。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对世界近代文明所起的作用是人所共知的。中国的某些文献、著作，已被翻译、介绍到国外。世界的许多国家都有研究中国文化遗产的专家。中国的哲学、中国的文学艺术、中国的医药、中国的历史以及中国科技等方面的历史遗产，都受到了不少外国学者的重视。但是，中国经济思想的历史遗产，却迄今仍然不太为人们所知晓；不但外国人士感到陌生，即使中国学术界甚至中国经济学界也有很多人未予以足够的重视。

多少年来，国内外都有一些人对中国经济思想的历史遗产抱有这样那样的误解和偏见。这些人认为，中国历来没有什么值得重视的经济思想。有的西方学者断言，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的“古老文化中”没有“足以同中世纪西方的经院学者们在经济分析

方面所做出的良好开端相媲美的东西”。^① 旧中国的一位大学教授也曾说：中国的经济思想遗产“与今之欧美经济科学比较，本无一顾之价值”。^② 甚至连一位曾经发表过中国经济思想史小册子的人也说，他认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所能够提供的主要“利益”之一，就是可以使中国人“自知不足”。^③ 换言之，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意义就是为了证明中国没有什么象样的经济思想遗产！

其实，经济思想并不是什么神秘的、深不可测、高不可攀的东西，它不过是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经济条件和经济关系在观念形态上的表现。只要有人类的社会经济生活，就有相应的经济条件和经济关系，而这些经济条件和经济关系，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就会逐渐在观念形态上表现出来，形成各种各样的经济思想。经济思想从来不会是某些国家、某些民族的专有物。

中国大陆是人类最早栖息的地区之一。云南的元谋猿人生存的年代已测定在距今一百八十万年至二百万年以上。中国大陆上已发掘出的其他几种猿人，如蓝田猿人、北京猿人等，也都生存于几十万年以前。中国不仅进入文明史较早，而且在十六世纪以前经济、文化的发展长期走在世界的前列。在公元前三世纪秦始皇统一六国时，中国已拥有两千余万人口和数百万平方公里的疆域，此后两千年中，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封建帝国。如此伟大的古代民族，如此发达的古代经济、文化，怎么可能没有自己的象样的经济思想遗产？中国的经济思想怎么可能会贫乏、浅薄到“无一顾之价值”呢？

诚然，在 1840 年的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没能产生出作为一门

① 欧·泰勒：《东方经济思想及其应用和方法》。见《美国经济评论》1956年5月。

② 赵兰坪：《近代欧洲经济学说·自序》，商务印书馆 1933年。

③ 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 1926年，第 16页。

独立科学的经济学。^①近代、现代的中国人所知道的经济学，是鸦片战争后从西方输入的。但是，中国古代没产生经济学这门科学决不等于没有自己的经济思想，不等于在经济思想方面没做出过有价值的贡献。经济学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时代的产物，在这一时代以前，世界上的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也没有经济学，而只能有一定发展程度的经济思想。资本主义时代以前的经济思想，自然是比经济学较低发展阶段的东西；但是，它却是现代经济学的出发点和历史前驱，没有前代的经济思想资料，经济学这门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是难以想象的。决不能因为古代的经济思想在水平和发展阶段方面低于现代的经济学，就采取肆意加以鄙弃的割断历史的态度。西方的近代、现代的经济学者，并不贬低古希腊学者的成就，而总是怀着崇高的敬意来谈论古希腊学者。事实上，认为自己的经济思想遗产“无一顾之价值”的中国学者，也并不鄙薄古希腊学者，甚至还可能是“言必称希腊”的。

古希腊人在经济思想方面的成就诚然值得尊敬；中国古人在经济思想方面的造诣也绝对不是“无一顾之价值”。

从现存的一些古文献看，早在公元前八世纪以前，已经出现了不少值得重视的经济观点。在公元前六世纪至三世纪之间，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已达到一个群星竞辉的阶段；关于经济问题的广泛的探讨和议论，成了当时思想界百家争鸣的一部分重要内容。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农家、商家等学派都较为完整地提出了自己对经济问题的见解，一些重要的学者对经济问题的论述，都已形成了初步的学说体系。在财富、分工、交换、价格、价值、货币、赋税等

^① 我国在东晋初(公元四世纪)人们已较普遍地使用“经济”一词，晋元帝褒美纪瞻的诏书就说：“瞻忠亮雅正，识局经济。”《晋书·纪瞻传》。至迟在公元八世纪的唐代已使用“经济学”一词，唐严维诗就有“还将经济学，来问道安师”之句(见《全唐诗》卷二百六十三)。但它的意义为“经世济俗”、“经国济民”之学，同现代的经济学不是一回事。

范畴以及某些经济原理方面的分析，较色诺芬、亚里斯多德等古希腊学者也并无逊色。秦汉以后，中国经济思想仍然继续有所发展。贾谊、司马迁、桑弘羊、王符、李觚、王安石、邱潜、黄宗羲、王源等在经济思想方面的成就，也都颇有可观。对封建社会各种基本的经济问题如土地制度、地租、赋税、徭役、高利贷以及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关系等问题，历代都不断有人探讨和论述，积累下了大量宝贵的文献资料；对轻重、屯垦、漕运以及土地兼并等问题的探讨，更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所特有的内容。许多重要的经济、财政方面的观念和原理，如合理利润率，货币数量说、货币流通速度、财政上量出为人原则以及经济政策方面的干涉主义和放任主义等，中国人的发现都先于欧洲，中国古代反映货币拜物主义的作品，远比欧洲更多、更早，而且更深刻。事实表明，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曙光时期到来以前，中国人在经济思想方面的成就是长期走在世界前列的。那种认为中国“四千年间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①的论调，不论从一般思想史或从经济思想史来看，都是没有根据的。

在鸦片战争以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水平自然低于西方国家。但是，即使在这时，中国经济思想也并不是“无一顾之价值”。

近代中国是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中最大的国家，又是各帝国主义共同榨取和疯狂争夺的半殖民地。中国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而进行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极其艰苦，极其激烈。这种斗争需要经济思想，也必然产生独特的经济思想。因此，近代中国的经济思想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经济思想中，也具有典型的意义和较高的水平。

那么，中国经济思想的历史遗产何以长时期得不到国内外经济学界应有的重视呢？前述对中国经济思想遗产的那些误解和偏

^①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1页。

见又何自来呢？这主要是由于：

第一，我国学术界对中国经济思想的历史遗产的发掘、整理和介绍的工作，都做得不够，还未能为人们较全面地了解中国经济思想遗产提供必要的研究基础。

中国经济思想遗产异常丰富，有关图书、文献汗牛充栋，而且非常分散。这些文献、资料又是用古汉语写的（近代的一部分著作除外），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文字古奥费解。中国的很多经济学者对这些文献、资料利用起来都有相当困难，一般外国学者更无力问津，需要靠专业研究者提供经过整理、研究的材料和成果。由于长期以来对中国经济思想遗产的发掘、整理和介绍的工作得不到有力的支持，这类工作进展不快，迄今基础仍较薄弱。同研究中国文化遗产的其他一些学术领域（如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经济史等）相比，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况，从业人员少，已出版的著作、论文和经过整理、编辑的资料为数不多。这就使得中外经济学界的广大人士难以对中国经济思想的丰富遗产有必要的了解，从而不容易做出有根据的评价。

第二，殖民奴化思想的影响。

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于殖民掠夺和殖民统治的需要，长时期中有意识地散布对被侵略、被压迫民族的轻蔑、污辱的言论，诋毁它们的民族文化，把这些民族诬蔑为智能低下的、野蛮的民族，只配成为别国统治、奴役的对象，而无独立、自主的资格。在这种殖民奴化思想的长期影响下，西方国家的某些人士产生了对被侵略国家的民族文化的偏见；而被侵略国家的某些人则失去了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尊心，产生了对外来文化的盲目崇拜和对自己文化遗产的妄自菲薄，产生了严重的民族虚无主义心理。

帝国主义殖民奴化思想的影响不止限于经济思想领域，在文化遗产的其他研究领域也是存在的。但这种影响在经济思想领域所造成的误解和偏见，却比在其他领域更为严重。外国汉学家中有